



红军西征在宁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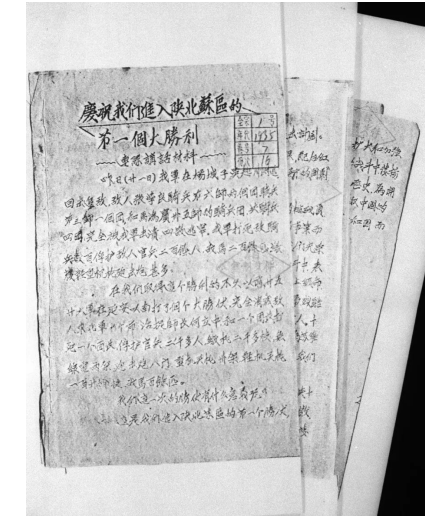
以攻取宁夏为目标的打通国际路线战略(下)

实施宁夏战役 欲打通“国际路线”

1936年5月至9月,一方面军通过西征战役、四方面军通过岷陕西固战役、二方面军通过成徽两康战役,形成陕甘宁、甘南、陇南3个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的战略区域,产生三大红军主力齐聚陕甘宁、相互策应的战略态势,造成“会合之势已成”的大好局面。到10月初,西征红军控制了东起界石铺、西至会宁间100多里长的地段,扫清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的障碍。四方面军实施通庄静会战役,经通渭、漳县等地向静宁、会宁区域挺进。二方面军也从陇南临时根据地出发,向静会地区进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态势完全形成。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使得红军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具有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实力。

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涌动,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介石。为解决事变,蒋介石急调重兵回防,并进行内部策反,西北战事暂时无暇顾及,这无疑减轻了红军的军事压力。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积极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通过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两次“肤施谈判”,促成了“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尘埃落定”,有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动议,加之对宁夏“二马”、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及哥老会统战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西北地区出现了团结抗日的良好局面。所有这些为红军实施宁夏战役提供了良好机遇、创造了必要条件。

8月3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冬季以前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要求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尽快与一方面军会师,之后以一个方面军据守苏区,两个方面军利用结冰之际渡过黄河占领宁夏,接近绥远,背靠苏联。9月14日,毛泽东等人电告四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明确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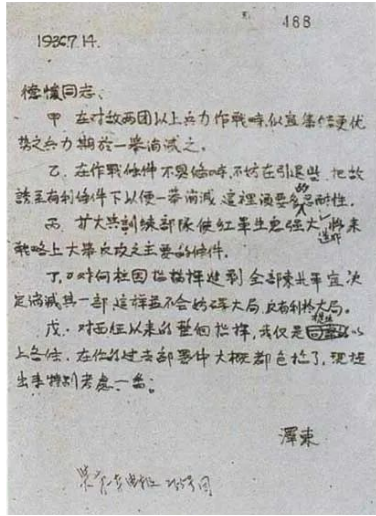


1935年11月22日印发的西罗镇战役捷报——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

二方面军负责钳制与策应,扼阻胡宗南部。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夺取宁夏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任弼时亦可巩固”,并成立以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的宁夏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前准备工作。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就集中攻占宁夏复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再一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豫、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

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即宁夏战役计划,指出整个宁夏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实施。10月11日至11月10日前为战役的准备阶段。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整补充,抓紧训练,加紧造船,做好进攻宁夏的一切准备;11月中旬起为战役的实施阶段。以一方面军主力和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攻宁夏部队,向宁夏发起全面进攻,四方面军另外两个军和二方面军主力向南防御,必要时抽调一部分参加攻宁。宁夏战役计划发布后,毛泽东于10月13日致电彭



毛泽东为西征作战给彭德怀的电报。

德怀,要求按十月作战纲要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德、张国焘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10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6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攻取宁夏的军事行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领导下,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组织实施。10月24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复电同意红军总部关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部,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时属宁夏省),相机攻占宁夏的具体作战计划。并要求加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协同作战。

就在红军各参战部队进入战役状态且部分兵力已渡过黄河实施局部作战之际,战场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时间和兵力重新向红军发起进攻。30余万国军精锐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发起进攻,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境内。

形势的突变使得党中央意识到必须调整原定作战计划,掌握战场主动,以确保宁夏战役的继续实施。10

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调整后的作战计划要求红军各部队首先击破南来之敌,在南敌受阻后再转向北攻取宁夏。具体部署为:除四方面军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外,另外三个军和二方面军全部集结在河东,歼灭南敌,随后从中宁渡河。同时以四方面军两个军和二方面军进行南面防御,防止敌军再度进攻;一方面军占领金积、灵武,加紧造船,准备渡河进攻宁夏;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派一个军占领定远营。因定远营是保证宁夏战役顺利实施进而打通国际路线的首要目标,也是红军通过绥远在蒙古国边境接受苏联援助的重要通道,该部署实际上是在阻击南敌奏效的前提下让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与河东红军一起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10月30日,中革军委批准29日彭德怀等制定的旨在将三个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海原、打拉池地区追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海打战役计划》。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利,则全局转入佳境矣”。中革军委又一次重申:只有先击破南敌,才能继续进行宁夏战役创造条件,而海打战役则起到盘活整个战局的关键性作用。

但张国焘却令四方面军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一带,三十一军撤至豫旺、王家团庄一带,实际上是中央作战部署相悖的变相撤退,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国民党军队推进速度很快,红军主力与渡河部队的联系被切断,致使四方面军一部孤悬河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中央制定的先击破南敌、再北进宁夏的战略方针无法实现,宁夏战役被迫中止,以攻取宁夏为目标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无法付诸实现,这就有了后来组建西路军征战河西、挺进新疆的悲壮征程。

(据山西党史网、共产党人杂志社)

赫光: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赫光。

赫光,原名万锡绂,字季玺,1902年2月9日出生于今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他16岁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今平凉一中),他勤奋好学,助人为乐,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和称赞。1922年,赫光考入北洋军阀吴佩孚办的洛阳讲武堂。当时,马列主义已在全国传播,讲武堂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讲武堂,赫光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赫光从讲武堂毕业后,被军阀吴佩孚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不久,擢升为迫击炮营营长。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部在秦皇岛被奉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赫光从战场脱险后返回家乡。他目睹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黑暗,心中开始燃起了救国救民信念。当时,赫光的父亲因次子死于海原大地震,长子在外做事,便要求赫光留在身边料理家事。但赫光说服了父亲,辞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途。1925年6月,赫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坚守党的初心,勇担党的使命,踏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征程。

1926年冬,中共豫陕特委考虑到赫光上过军校、打过仗,就派他从事兵运工作。赫光和苗广义、刘明德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受中央军委派遣到安徽阜阳,进入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以军部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遭杀害,党组织指示赫光利用在军部任职的有利身份隐蔽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并被指定为留队人员负责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沉着冷静,机警干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8年,赫光离开四十七军军部,当了营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高桂滋部被缩编为第十一师,赫光被降为连长。到1931年,经过数年的努力,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发展到五六十名,骨干多集中在赫光所在的一团。

1931年5月,中共山西特委认真研究,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发动兵变,计划将高桂滋部3个团拉出来,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央军委批准了该计划,并决定在兵变成功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和其他同志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对兵变作了周密安排。

6月下旬,因有叛徒告密,中共山西特委指示立即在平定发动兵变,并派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协助赫光领导兵变,决定于7月4日晚12时举行兵变。但因部队手枪连一个班长醉酒泄密,敌人便在城内加强警戒,调兵控制了重要通道。赫光当机立断,下令提前半小时行动。晚上11时30分,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著名的“平定兵变”爆发。

7月5日晨,起义的七个连,共1100余人集结在孟县清城外。谷雄一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赫光被任命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下辖两个纵队。赫光站在一个土丘上讲话,他激动地说:“从今天起,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了!红军有红军的纪律,有红军的政策,我们要坚决执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假。要爱护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要公开买卖,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后如有违犯者,均按军法处置。”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五台山挺进。为了巩固发展革命实力,红二十四军向晋冀两省交界的太行山中段、敌人力量薄弱的河北阜平县发展,建立根据地,之后向五台山进军。

7月20日,红二十四军占领阜平县城。21日,打开监狱大门,释放“囚犯”。在开释囚徒大会上,赫光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旧衙门是咱穷人的阎王殿,监狱就是鬼门关。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是为穷人天翻地覆的。大家团结起来,打烂阎王殿,砸断铁锁链。愿意闹革命的参加红军,不愿意的请回家去吧!”话音刚落,几名被释放的青年“犯人”当即报名参加了红军。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跪倒在地,热泪盈眶地说:“红军是咱穷人的救命恩人。我老了,不能从军,就让我儿子参加红军吧!”赫光和谷雄一连忙扶起老人,并好言相劝。没过几天,老人就让儿子参加了红军。22日,红二十四军张贴布告,召开分粮大会,公开放粮。

通过释“囚”、放粮及宣传教育,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清晰的认识。赫光和其他同志一起,与当地共产党员、群众反复商量,酝酿建立阜平县革命政权。7月26日,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县苏维埃政权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华北,给深受压迫的群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惧,并密谋消灭红二十四军。

阜平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汉奸钱爆发发了张(张学良)石(石友三)战争。石友三腹背受敌,落荒而逃,投奔了山东韩复榘。石部师长沈克投降张学良,张学良以拿下阜平、消灭红二十四军为接收及改编其为新编第一师的条件。于是,沈克施展诈降计,派两个旅到阜平以东的王快镇,诡称“走投无路,向往红军”,并派代表到红二十四军,要求收编。红二十四军的领导核心在“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下,片面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对沈克诈降失去警惕,决定收编。

8月9日,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等25位同志赶往王快镇去受降,被沈克秘密逮捕。8月10日,沈克派赵海清旅从王快镇开往县城,诡称“奉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赫光安排他们住在城里的法华村。下午,赵海清又派一名副官到红二十四军军部,以“给养困难,军心涣散”为由,要求赫光尽快收编,以稳定军心。11日晨,赫光等人携带慰问品赶到法华村。到达后,见匪军荷枪实弹,岗哨林立,赫光察觉有异,但他毫无惧色,沉着而稳健地一步跨上台阶,大声喊道:“你们起义,咱们是一家人了,今后共同对付敌人,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压迫的穷苦大众。”“穷人谁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们要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老财,打倒军阀,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赫光义正词严的演说打动了士兵们,他们个个直愣愣地盯着赫光。匪军原以赵海清将须为信号逮捕赫光,而此时赵海清将几下胡须,仍不见士兵行动,遂脸色大变。赫光看出了敌人的诡计,严厉地提出警告。赵海清情急之下扑上前去,拦腰抱住赫光。赫光拔出手枪,打中赵海清的大腿,与之展开肉搏。最终,赫光遭到阻击,英勇地倒在了血泊中,牺牲时年仅29岁。

赫光是宁夏走出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宁夏人民的骄傲。1960年,阜平县政府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将赫光等烈士的骨灰盒安放其中。中共阜平县委也提出了“发扬赫光精神”的口号,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据宁夏党史教育网)

坚持群众路线: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价值取向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坚定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一贯做法和重要经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始终把党的群众路线置于核心位置,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短短13年间,边区政府高效出台了1000多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逐步构建起较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法治建设始终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切实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主权利,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认可与坚定支持。这为巩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立法环节,党的政策指引为边区立法明确了方向。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其中,《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确定了边区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1942年完成了乡选举。随后,三三制原则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得到实行,对广泛动员群众、推动抗战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边区立法提供了有力保障。党深入组织动员群众,始终坚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路线。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领导所辖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普选活动。党的立法过程广泛吸纳了群众意见。边区政府在制定颁布每一项法律法规之前,都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在参议会集体大多数同意的情况下,法律法规才能得以颁布执行。

陕甘宁边区的立法实践真正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曾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

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边区参议会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立法的核心指导思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系统地规定了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以法律形式确认人民各项民主权利,成为边区政府保障民主的准绳。林伯渠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保护各个革命阶级的利益,纠正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在法律面前虚伪的平等,而代之以真正的、实质的平等。

在边区司法实践中,我们党创造性将群众路线与司法工作紧密融合,推行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生动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1944年,习仲勋提出司法工作人员要时刻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此外,“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堪称党领导下司法公正创新的重要典范。他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将这一审判方式精辟地总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1943年的“封捧儿婚姻案”就是这一审判方式的生动实践。这些例子充分证明,当司法工作紧紧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就能得到广泛支持和无穷力量。

为实现司法服务的普惠性,陕甘宁边区坚持“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明确规定“处理与接收案件,一切应便利人民,少拘形式”,畅通了群众的诉讼渠道,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真正保障了人民的诉讼权利。例如,《民诉条例草案》第十二条,《刑诉条例草案》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口头诉讼的合法性效力,使得人民可以口头案情,由法院负责制作笔录,免除了被代写诉状人勒索的风险。此外,《陕甘宁边区保障人

权财权条例》《民诉条例草案》《刑诉条例草案》还作出了免除诉讼费、不收送达费和抄录费等规定,有效减轻了群众的诉讼成本,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间调解在定分止争、事心双解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边区民间习惯以宗族、邻里、乡里调解纠纷的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在持续推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司法变通之道,大力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倡导“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乡政府领导下,由乡长、自卫军连长、乡邻好主任组织调解委员会,各行村可由人民自行选举人民仲裁员、人民检查员,参加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一举措明确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实施主体。随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进一步强化了调解工作的制度性与程序性。随着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推广和深化,调解组织网络日益织密筑牢,在解决边区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党以法治教育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功能。同时,针对边区人民的受教育情况,将法治教育融入文化教育之中,实现识字懂法的双重目标。此外,各级党组织还通过报纸、画报、戏剧、快板、歌谣等多种形式,将难懂的法律语言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达,向群众传递法治信息。例如,宣传土地法的《咱们村来了土改工作队》、宣传婚姻法的《反对旧婚姻》等歌谣,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更要坚持从严治党,不断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响应群众呼声惩治腐败,选拔符合人民要求、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1937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而周密的讨论,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判决。在党的领导下,边区相继颁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同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从而将从严治党司法原则确立下来。

然而,仅仅依靠惩戒并不能完全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因此,陕甘宁边区坚持对党员干部开展深入的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司法训练班(党校及党的训练班)、行政训练班、群众工作训练班等,发动干部系统学习边区的重要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尊重与服务意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更是要求干部们“甘当小学生”,在革命实践中“清洗自己的污浊”。此外,他还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秉持这一理念,党领导边区政府与参议会不断探索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以设定专门行政机关监督到辅助行政机关监督,不断拓展群众参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局长肖玉璧因私自将边区极为稀缺的食盐、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被群众检举告发,最终判处死刑。在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体系中,党始终坚持聆听群众声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在边区的13年间,林伯渠共收到百余封检举控告材料,他全部亲自回应、解决并反馈,充分展现了党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和对干部队伍严格要求。

(据《光明日报》)